

我与中国哲学史

我在中学读书时，即对于中国哲学史很感兴趣。幼年时在家塾诵读《论语》、《孟子》只是背诵，不晓其义。到十几岁时读了周敦颐的《通书》和张载的《正蒙》，才对于孔孟的哲学思想有所了解。初读《老子》，如堕入五里雾中，莫明其妙。后来读了一本题为《新解老子》的书，其中说：老子所谓道即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原理，于是对《老子》有所了解。嗣后，我阅读了梁任公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及《清代学术概论》、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对中国哲学史很感兴趣。

三十年代初，我阅读了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的学术著作，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有所了解，颇想写一本中国哲学史。这时冯友兰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了，其考证之精，分析之细，使我深深敬佩！当时我想，如果再写一本“中国哲学史”，很难超过冯著的水平，于是试图改换体裁，撰写一本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从1935年1月开始写，到1936年7月写出初稿，题为《中国哲学大纲》，约五十万字。

我写《中国哲学大纲》，意在揭示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所运用的概念、范畴作了比较明确的阐释，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特点作了比较切当的说

明。全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宇宙论，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第二部分是人生论，相当于西方的伦理学说；第三部分是致知论，相当于西方的认识论。宇宙论又分为本根论与大化论。本根论相当于西方的本体论，大化论相当于西方的宇宙演化论。我们所以不用一般常用的名词，而改用中国哲学中固有的名词，意在表明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本书主观上是想全面显示中国哲学理论的全面内容，实际上也有疏忽之处，如宇宙论方面论述了理气、心物诸问题，而对于形神问题却忽略了。致知论中叙述了古代关于知识的观点，却未讲关于知行问题的辩论。这些缺漏，在再版时才加以补充。

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我着重论述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中国古代唯物论的主要形式是气一元论，我较详地叙述了气一元论的源流。关于宋元明清哲学，一般认为只有两大派别即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我指出还有以张横渠、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为代表的唯气论。后者冯友兰先生晚年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也同意宋明哲学有三个学派的观点。

在撰写《大纲》之前，我对于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想已有所阐述，发表了《中国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与《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两篇论文，在《大纲》中更加详论，对于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作了较详的评析。

《中国哲学大纲》初稿是 1936 年写成的，我请冯友兰先生审阅，冯先生认为有一定价值，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接受了，当即付印，值日寇侵华，上海陷落，未能出版。到 1943 年，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先生听说我写成《中国哲学大纲》，恐其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在中国大学印为讲义。到 1956 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发现了此书的纸型，决定付印，

于 1958 年正式出版。到 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议出修订版，我略加补充。以后又两次重印。

1945 年抗战胜利，1946 年清华复校，我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那年冯友兰先生赴美讲学，我替冯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

1948 年末，清华园解放，1952 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的哲学系并入北大，我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4—55 年度，开始讲授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由冯友兰先生讲先秦哲学，我讲汉唐至明清。我撰写了《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

五十年代初，我发表了几篇论文：《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张横渠的哲学》、《中国古典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又撰写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及《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两本小册子。

1954 年我买到明代王廷相的《王氏家藏集》（明版），非常欣喜，计划对王廷相的哲学思想进行全面的 research。不意 1957 年遭遇变故，陷入“反右”扩大化的网罗，工作计划都打乱了。我被迫停止了教学研究 work。1965 年参加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 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术研究都停顿了。1969 年到 1970 年，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当年冬回校。1972 年，领导号召“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受命编写《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我担任其中宋元明清部分的撰写 work。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1973 年，“评法批儒”运动开始，我奉命为哲学系学生讲解儒法两家的历史资料。

1978 年领导拨乱反正，学术研究 work 逐渐恢复正常。

1978年冬在山西太原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会”，会中决定成立“中国哲学史学会”，我被推为会长，任继愈、石峻、冯契任副会长。

1979年1月，北京大学党委宣布：1957年张岱年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于是完全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

1978年北大哲学系重新招收硕士研究生，由我担任主考，录取了程宜山、王德有、陈来、刘笑敢、李中华、陈战国、吴琼、鲁军等十人，我讲授两门课程，一为“中国哲学史史科学”，二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后来将讲稿整理成书，正式出版。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发表了一系列中国哲学史论文，这里试述其主要内容。

(1) 关于孔子

对于孔子，我向来采取分析的态度，我肯定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同时也认为孔子的学说也有缺点。“文化大革命”后期，发生了“批林批孔”运动，批林是有道理的，将孔与林联系起来，就没有道理了。但在当时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只能做到不随声附和而已。拨乱反正以后，出现了对孔子评价问题的讨论。我写了《孔子哲学解析》、《论孔子的哲学思想》、《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孔子与中国文化》、《论孔子之是非》、《论孔子的崇高精神境界及其历史影响》、《孔子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等论文，对于孔子思想进行辩证的分析，认为孔子虽述古而非复古，虽尊君而反对独裁，虽信天而怀疑鬼神，他整理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献而提出自己的一贯之道，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基础。他不重视生产劳动，称“请学稼”的樊迟为小人，表现了一定的偏失。1983

年，在曲阜的一次讨论会上，我发言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应科学地研究孔子、评价孔子”。这是我对于孔子研究的基本态度。

（2）关于老子

在三十年代，我曾发表过一篇考证老子年代的文章，认为老子的年代应是在墨子之后，庄子之前。五十年代，我重新考察老子年代问题，认为《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以德报怨”的批评，《中庸》记载孔子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显然是指老子而言，足证孔老同时的传说还是有根据的。于是重新肯定了《史记》关于老子的记载。对于老子所谓“道”，也重新加以考察，认为老子所谓道指超越一切事物的绝对，既无物质性，也无精神性。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创者。

（3）关于《易传》

我认为《周易大传》是先秦辩证法的最高典范，在中国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我考察了《易传》的年代问题，认为《易传》作于惠施、庄子之前，应是战国前期的作品。

（4）关于庄子

五十年代以来，许多论者认为庄子是主观唯心论者，我以为是。我认为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强调“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道是客观的，心能体道，而道不从属于心。我写了一篇《论庄子》，认为庄子哲学可以称为直觉主义。

（5）关于宋明理学

关于宋明理学，我写了《关于宋明时代的唯物主义及其唯心主义的关系》、《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关于宋明理气学说的演变》等论文，认为宋明理学一方面加强了封建礼教，

应予严肃的批判；另一方面理学在理论思维上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还是应该研究的。

(6) 关于天人合一

1984年，我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观念的起源与演变，对于董仲舒、张载、二程以及王夫之、戴震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异同进行了评析，并引证恩格斯所谓“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加以说明。

(7) 关于中国哲学中的价值学说

八十年代，我发表了《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中国哲学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国哲学中的价值学说》等论文，提出了关于中国哲学史上的价值论学说的研究，阐述了古代儒家、道家、墨家与法家的价值学说，从而开拓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区域，这是多年以来哲学史著作中都未谈到的。我只写了几篇文章，而未能写出专著。

(8) 关于中国古代唯物论的理论形态

九十年代初，我写了一篇《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演变》，评述了中国古代唯物论的主要理论形态，认为中国古代唯物论的主要理论形态，一是自然论，导源于老子，以王充为代表；二是唯气论，导源于先秦，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三是唯物论，以裴頠为代表；四是无神论，以范缜为代表。后来在《中国唯物论史导论》中又作了一些说明。

(9) 关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如恩格斯所说，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题，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如何呢？我认为，在中国哲学中，与

西方所谓思维与存在的问题相当的是理气问题。在西方，基本问题的另一表达方式是物质与精神的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则是心物问题。理气问题与心物问题都是在宋明哲学中逐渐明确起来的。我在 1991 年写了《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辨析》，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了一定的说明。

九十年代，我又撰写了两本专著，一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二为《中国古典哲学基本概念范畴要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论述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如“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人性问题、“仁爱”学说的评价问题、对于“纲常”的分析等。《中国古典哲学基本概念范畴要论》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概念范畴作了系统的简要的论述，但其中对于有些范畴的解释较《中国哲学大纲》所说为详。

我自三十年代初研究中国哲学史，到现在近七十年了。我阅读了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朴学的著作，对于佛学及道教则未加钻研。我兼阅西方哲学著作，学习了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努力运用逻辑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我主要阐明了中国的古代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以期对于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所助益。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世纪，在民族由衰转盛的时代中，个人生活亦难免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许多年月光阴虚度，不能正常从事研究工作。1978 年拨乱反正以来，沐浴改革开放的新风，励志学术研究，而已年近古稀了。《书品》编辑部同志邀我写一篇“我与中国哲学史”的文章，盛意难却，但耄耋之年无力详述，只能略述大略，读者谅之！

1997 年 10 月 23 日

中国文化的新时代

一 文化发展的曲折道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时代，也是大动荡、大转折的时代。三百年前明清之际，有的思想家曾说当时是千古未有之变局。实际上，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更是千古未有的大变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遭受前所未有的屈辱，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有识之士奋勇急起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经过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然后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斗争。1937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全面侵华，经过八年全民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之后又经过解放战争，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结束了百年的民族屈辱的局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之后又走过曲折的道路，到 1979 年拨乱反正，确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正确方针。今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湛理论，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前几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深切的反思，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作了比较，发

现中国确实落后了，必须改弦更张、急起直追，于是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作为前进的目标。这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士要求全面抛弃旧传统，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于是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有一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感情较深的学者则强调东方文化的优越性，主张发扬传统文化。这形成两个极端：全盘西化论者只见到中国文化的落后缺点，而不了解中国文化也含有优秀传统；东方文化论者只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严重缺陷。惟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提出了正确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选集》1969年横排本第667—668页）这是三十年代文化讨论的正确结论。

据记载，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审阅陆定一同志所写《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读中国教育史，应该提到他们（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 8 月版)。

这段话是关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非常精辟的论述，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

不幸的是，就在 1958 年前后，极左思潮日益高涨起来。到 1966 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破四旧”的名义，把传统文化全面否定了，确实是史无前例。于是中国文化遭到空前的浩劫。到七十年代初，又兴起了所谓“批儒评法”，对于传统哲学进行了肆意的歪曲。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出现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大曲折。

1978 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嗣后，1991 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思想的多元化……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我们应该牢牢掌握有中国特色文化的这些基本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确实是文化发展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将迅速发展起来。

二 文化形态的具体转变

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形态已有重大的转变。首先，物质生活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以衣食住行而言，衣服样式、房屋建筑、交通工具，都已采用了西方的方式，衣服穿中山装或西

装，房屋住楼房，汽车火车飞机也都是向西方学习的。惟有饮食仍保持了固有传统。实际上，西方的分餐方法也是应该学习的，但筷子是中国的独特贡献，远胜西方的刀叉。总之，衣食住行，除了食之外都已大大改观了。

对于知识的态度是文化生活中一个关键问题。古代儒家兼重仁智，对于知识是比较肯定的。但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是人文知识，对于自然知识不甚注意。道家是反智的，老子宣扬“绝圣弃智”，庄子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庄子·人间世》）以知识为凶器。道家对于宇宙哲学有重要贡献，而反智态度对于文化发展则起了消极作用。惟有墨家重视知识，但秦汉以后墨学中绝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科学，肯定了知识的重要价值。这是一个大进步。但是，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发生了对于知识的反动，有人竟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既贬低了知识，更贬低了知识分子。在全世界各种科学高度发展的时代，竟出现了鄙视知识的谬论，这是令人惊异的。这是民族的耻辱。1979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纠正了贬低知识、压抑知识分子的失误，于是文化发展又走上光明大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的大旗，于是自然科学逐渐发展起来。这是文化生活的一项重大变化。多年以来，大学教育出现了重理轻文的倾向，这可以说是对于过去传统的矫枉过正，在一定意义上有其必要。中国已产生了自己的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从长远考虑来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也应受到重视。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哲学领域也冲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地传播起来，另一方面涌现了一些学贯中西、自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家（其主要代表有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从而形成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五四”运动，“当时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1967年横排本第660页）。当时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完全成功了，白话文成为通用的文体，文言文退居次要地位。反对旧道德也发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旧道德破坏了，而新道德却未健康地建立起来。反对旧道德主要是批判“三纲”，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有人把“五常”与“三纲”联系起来，一齐加以批判。而“五常”的情况比较复杂。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既含有时代性阶级性的内容，也含有普遍性超时代性的意义。在今天的社会中，爱人民（仁）、明正义（义）、有礼节（礼）、辨是非（智）、守信用（信），还是必要的。五十年代，宣扬共产主义道德，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一切道德规范，八十年代西方的非道德主义思潮又传入中国。建立新时代的道德规范是今天的一项严肃任务。

三 新价值观的确立

如上所述，近一百五十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化已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在学术研究方面，自然科学已跃居首位，受到异常的重视。在语言文字方面，白话文已成为通行文体，文言文降到次要地位。在社会道德方面，“三纲”观念

已受到激烈的批判，但是新的道德范畴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转变中。

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新文化的发展的关键在于价值观的批判继承、革旧立新。

中国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价值观的论争；中西文化之异同也系于价值观的异同。

一些关于价值观的争论问题，经过历史的检验，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

价值观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义利问题、理欲问题、德力问题、法教问题。

(1) 关于义利：儒家重义轻利，墨家以为义即是国家人民之利。董仲舒宣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受到宋明理学家的称赞，反理学的思想家如叶适、颜元等则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在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家可以说是讲“义”的，功利主义者则宣扬功利。时至今日，义与利的统一已为人们所认识。个人的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应受到称赞。反之，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应受到谴责。换言之，“见利思义”是必要的；“见利忘义”是可耻的。

(2) 关于理欲：宋明理学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把理欲对立起来，受到唯物主义哲学家罗钦顺、王夫之等的批评。清人戴震强调“理存乎欲”，肯定理与欲的统一，指责宋明理学是“以理杀人”。西方理性主义者高度赞扬“实践理性”的尊严；而快乐主义者则以快乐为道德的准绳。理欲问题不仅是中国哲学所独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宋儒“理欲之

辨”受到人们的讥笑、訾议。事实上，宋儒理欲之辨固然是偏谬的，而戴震所谓“理存乎欲”也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人们的欲望是不可能无限地满足的，必须加以制约。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节欲”还是必要的

(3) 关于德力：孟子宣扬“以德服人”，不赞同“以力服人”。韩非重力轻德，认为“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韩非子·八说》)。事实上德与力是相辅相成的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这完全忽视了武力的作用，确实是“迂远而阔于事情”。韩非宣传道德无用论，否认仁义的积极作用，认为“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事实上，国家的富强与人民道德的提高是相互裨益、相得益彰的。经过二千多年的历史考验，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

(4) 关于法教：儒家主张“德治”，认为法律与刑罚是次要的。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不承认道德教育的价值。孟子也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虽然肯定了法的必要，但没有提出具体的规制。惟有齐国的管子学派兼重法教，但是《管子》书中的“法治”学说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真正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现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确立彻底的“法治”。法治与教育是应该并重的。

以上义利、理欲、德力、法教等四个问题是价值观的具体问题。在历史上，哲学家们对于这四个问题有的提出了正确的见解，有的则不免陷于片面的偏见。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正确见解，纠正或剖析他们的缺失，这对于建立新时代的正确价值观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义利、理欲、德力、法教是价值观的主要问题，但还不是价值观的最根本的问题。价值观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个人与群体（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群体（社会、国家、民族）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个人也不能脱离群体而生活。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是一致的。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不能兼顾。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处理呢？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而精神生活有指导物质生活的作用。物质生活是人类与鸟兽所共同具有的；精神生活则是人类所独有的。如何看待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相对价值呢？

古代儒家强调群体重于个体、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所谓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都是以此立论的。道家则强调个体的重要，宣扬个性自由。法家则重讲国家的利益、否认精神生活的价值。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以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高涨起来，同时西方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德国思想家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传入中国以后受到许多学者的赞扬。“重估一切价值”是必要的，但是尼采鼓吹“权力意志”，鄙视人民群众，实际上是宣扬贵族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不足取的。我们应主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我认为，群体大于个体，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这是应该肯定的。群体（社会、国家、民族）应保护个人的相对自由，而在必要的时候个人应为群体做出牺牲。物质生活的富足是精神生活提高的基本条件，但是如果耽溺于物质生活的享受，而背离了对于真善美的追求，那将是卑鄙无耻的。

古代儒家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格尊严，又提倡个人对于

社会的责任心，宣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中国哲学优秀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但是儒家认为等级秩序是合理的，表现了明显的偏谬。道家对于等级制度持批评态度，这是道家的优长，但是道家忽视人的社会责任心，也表现了严重的不足。俱往矣！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儒道的理论贡献将得到发扬，而其缺失将得到厘正。

四 新中国文化的光辉前景

从上古三代到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转变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既有变革性，又有继承性的。新时代的文化只能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继承的过程中创建起来。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的创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发扬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并吸收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这是中国新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尊重，因其是客观真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必须弘扬，也因其反映了客观的规律。西方近现代思想，内容繁多、真伪杂糅，也有些确有所见，应该选择消纳。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长期延续发展从未中断的文化体系。虽然近三百年来落后了，但经过百年的努力，已逐渐赶上西方的先进步伐。今天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文化必将有迅速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光辉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1992 年 11 月 10 日

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随着时代的前进，哲学思维应有新的发展。这是合乎规律的。回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中国的哲学园地中曾经出现新的思想学说的端绪。到了今天，民族解放已经实现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危机已经解决了，社会经济已迅速发展起来，在新的形势之下，哲学应有更大的发展。当代中国哲学向前发展的前景如何呢？这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

一 古典哲学是思想发展的源泉

世界哲学有三大系统，即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每一大系统的哲学都有其辉煌的开创时代。这哲学思想的开创时代，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轴心时代”，这在中国是先秦时代，在西方是古希腊。现代西方有很多学者认为古希腊哲学至今仍是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中国的先秦时代的经典与诸子学说乃是汉唐宋明哲学发展的思想源泉。春秋战国时期，孔墨、老庄、孟荀的著作，在二千多年的长时期中，确实提供了思想发展的坚实基础。汉代独尊孔子，魏晋兼崇孔老，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